《徽州往事》：谍战小说的一次小收获

□ 江少宾

拿到张万金的长篇新著《徽州往事》（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时，我有些感慨。掐指算来，我们相识已经二十年了，岁月这把“杀猪刀”篡改了我们的容颜，但对文字的挚爱始终没有变。曾经的文学青年，如今已是文学中年。

写作是长跑，即便是天才，也离不开必要的文字训练。供职媒体的张万金显然深谙此道，他笔耕多年，先后出版了纪实作品集《生死协议》《大案迷情》、长篇小说《纪委书记的密杀令》等。但老实说，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作品，直到出版《徽州大宅》（2012年出版），他才真正找准了自己的写作方位，并在这个文本里，找到了一个作家的自信。深邃的徽州不仅点燃了他的艺术激情，也赋予他更多的小说素材和创作灵感。

我敬畏徽州的山水。多年前，我独自寻访过徽州的古村落，每一次寻访，我都滋生出终老徽州的念头。徽州确实是一座富矿，山川秀美，人文荟萃，足以滋养任何一位有雄心的作家。致力于徽州系列长篇小说写作的张万金显然也有自己的雄心，他显然想在地理意义的行政版图上，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坐标和文学谱系。为此他做了不少功课，一面多次深入徽州腹地，亲身感受古徽州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一面又从故纸堆里寻找蛛丝马迹。那些潜伏在泛黄书页里的只言片语，最终衍生为生动的小说细节，有的甚至成为布局谋篇、穿针引线的重要线索。作为“徽州”系列长篇小说之一，这一次，张万金将《徽州往事》的写作背景设在歙县雄村——雄村位于歙县县城西南十五公里，三面靠山，一面临水，“枝分叶散，所在为雄。”——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雄村人、茶庄老板曹正泰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故事。曹正泰的两个女儿（曹曼筠、汪晓茹）都是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小说因此有了谍战情节，以及姐妹俩的凄美爱情。当“谍战”和“爱情”在小说中相遇时，最终拷问的，通常是人性。诸多元素的渗透与叠加，尤其是对人性的拷问，增添了《徽州往事》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性，也在文本内部构建出一个丰盈的艺术空间，借用安徽省作协主席许春樵的话来说，“小说有青春爱情，有刀光剑影，多变的叙事手段，反思历史与人性，可谓谍战小说佳作。”

虽然《徽州往事》堪称安徽本土谍战小说的一次小收获，但《徽州往事》又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谍战小说。曹正泰是谁？他的祖上是大名鼎鼎的曹振镛，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历三朝、相两帝，福禄寿俱全。除了曹正泰，《徽州往事》中还出现了戴笠、杜月笙、胡蝶等风云人物，这使得《徽州往事》在写作手法上又有了历史小说、非虚构写作的某些表征，这在语言、结构以及文体意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自然与作者的媒体人身份有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作为小说家的张万金，并没有彻底摆脱自己的媒体人身份。媒体是一个和社会良知息息相关的职业。这让我想到众多媒体出身的作家，比如海明威、怀特、略萨、莫言，曾经的媒体人身份，或多或少地影响过他们的写作立场。“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在此背景下观照《徽州往事》，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用心。不过，我想，张万金对徽州的小说探索应该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徽州往事》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对于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个喜人的标志。

作品自己会说话，评论别人的作品也涉嫌虚荣。作为多年好友，我无意吹捧万金兄。写作经年，我们都不再需要无谓的吹捧。好在吾道不孤，我们一直在路上，心里亮着一盏灯。期待万金兄的笔触能向人性更深处挺进，写出更有文学意味、更有徽州底蕴的大作品。

渡江女英雄马毛姐

□ 金其恒

今年是渡江战役胜利70周年。70年过去了，女英雄马毛姐的名字还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久久难以忘记。马毛姐是无为县青岗乡马家坝人。马家坝靠近长江，沟汊纵横，湖泊密布，百姓大多以捕鱼为业。马毛姐家里除了低矮的小茅草屋和几亩薄田外，还有一只用以捕鱼的小木船，这就是全部家当。

无为是革命老区，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无为东部，濒临长江，与芜湖市隔江相望，江岸线长达125公里，是渡江战役的前沿阵地。1949年1月21日无为解放后，广大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的号召，积极报名支前参战。当听到需要船工支援的消息后，年仅15岁的马毛姐立刻自动报名要求参战。得到批准后，她整天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把船开到河中，教那些来自北方的战士拉蓬、撑篙、掌舵、下锚、识风向、辨方位，熟识水性。这样的“实战演习”，风雨无阻，雷打不散，一直坚持了51天，直到渡江战役的炮声打响。4月20日深夜，百万大军开始渡江。马毛姐不顾解放军战士劝阻坚持登上木船，在枪林弹雨中，不怕流血牺牲，连续四昼夜，哥哥划船她掌舵，硬是用木船运送解放军强渡长江。22日夜，船划至江心，她哥哥裤子被敌人子弹打穿，不免十分慌张，她却挺起身子安慰她的哥哥：“不要紧，用力划，快抵岸了。”妹妹的坚强激发了哥哥的勇气，船迎着激浪像箭一般地向前疾进，终于安全地抵达对岸。

在渡江战役中，皖北地区（当时安徽尚未建省）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共出动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279万人次，担架15000副，修复铁路210公里，支援粮食18万吨、大小车98000辆、船只10000多艘。（《当代安徽简史》）

渡江战役胜利后，为了表彰在支援解放大军渡江，取得渡江战役伟大胜利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皖北区共评选出英雄模范2200名，其中特等英雄3名，一等功臣296名，二等功臣429名，三等功臣973名，四等功臣499名。马毛姐被评为一等功臣。（安徽省档案馆资料）

渡江战役胜利后不到3个月，1949年7月15日，皖北区党委机关报《皖北日报》即在第三版刊登了该报记者南岗、屈健撰写的《女英雄马毛姐》一文，第一次报道了马毛姐的英勇事迹。一时，马毛姐的名字在无为城乡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1949年11月30日，皖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皖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宋日昌，副主任郑抱真、李云鹤于11月22日联名发函给巢湖专员公署，专门邀请马毛姐参加会议。函中说：“兹聘无为牛埠区马家坝渡江一等功臣马毛姐为皖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直接邀请代表，希转请于25日来肥参加会议。”（安徽省档案馆资料）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皖北召开的最高级别的人民代表会议。年仅15岁的马毛姐被“直接邀请”光荣地出席了这次盛会，是出席这次会议399名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代表。

就在这次会议上，作为皖北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参加会议的黄辛白（原高教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的丈夫）在大会发言中高度赞扬了马毛姐的英雄事迹，号召广大青少年向她学习。

我从田埂走来

□ 王富强

小时候，从课本里看到一段伟人的语录：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带着虔诚的信仰我走向农村，而且我坚信这块大有作为的天地，必将会有一番大有作为的收获。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四季忙碌的农耕生活，让孩子们也闲不下来，除了正常上学外，其它时间要在家里搭把手，比如放牛打猪草、捡粪拾麦穗等。到了暑假期间，还要参加双抢劳动，插秧、割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走多了，路熟了，我对每道田埂都了然于胸。纵横交错的田埂好似四通八达的公路，从这里走到那里，从田边走到地头。

田埂最宽处1～2米，最窄处30公分，中间有条放水沟，沟里有个截，旱时截打开放水进来，田里水蓄得差不多了就把截堵上。这些沟截给平坦的田埂带来人为的障碍，尤其是挑着重担走在田埂上，一定要看着脚下，稍不留神会崴脚会摔跤。但凡参加过农村劳动的人，个个都练就一套独特的本领，走田埂如履平地。来来往往的人把田埂踩得踏踏实实，晴天田埂上布满一层厚厚的弹灰，雨天就是一脚泥泞。在这窄窄的田埂两边，长满了野花野草野藤，可能是吸收田地的一点营养，它们疯狂地生长，深可没膝，光脚走过，这些草或藤有些碍事，常会扫腿、裹脚。有些草的叶芒很锋利，划到腿上还会留下一道血痕。

我青春的好时光在田埂上留下短暂的印记。生产劳动像一本连贯延续的长篇，一季接一季的庄稼，一茬接一茬的作物，育苗、浇水、施肥、锄草，必须精耕细作，每一道工序都颇费时日，不能急躁，更不能省略，否则你家地里的庄稼长得就比别人差。除了逢年过节给自己放几天假，其它时间基本上都泡在田地里。那时生态环境非常好，衍生出许多自然物种，各种虫灾侵害频发，家里专门购买一台肩背式喷雾器，按比例配好农药和水，连续按动手柄加压，打开阀门，药水从莲门头内像雾一样喷出，洒在庄稼的叶和茎上灭杀虫患。

繁重的体力劳动，人很累；清贫的家庭生活，人很苦。每年我都到城里的姐姐家客居几天，看到许多在农村不曾见闻的新生事物，每一次进城都会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思路，宽阔干净的柏油路，与泥土垒起来的田埂比真是天壤之别。从那时起，我原本清纯的内心陡生一份莫名的向往。而摆在我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在没有能力改变自己时，就必须选择一处角落、一席之地，默默接受命运最原始的安排。

田野里的活有始无终，田埂上的风清新宜人。沐浴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有时会变得懒散和懈怠，但生活的职责在时时提醒自己，不可以放下手中的铁锹和锄头，不可以卸下生活的责任和重担。乡村生活给予我的不仅是吃苦耐劳，而且还有非同凡响的人生感悟。在那个理想式微的环境里，我的心始终燃烧着一缕希望的火光，这点点星火引领我一步步向前走，从少年走到青年，从农村走向城市。终于有一天，我从田埂走了出来，对着身后一望无际的田野，我深深地鞠上一躬，流下心中感激的泪水。我是一位在田埂上长大的孩子，离开故乡，我结下了稻花的乡愁，我流下麦浪的泪水。他乡寻梦，走在前程茫茫的探索路上，从此我有了远方和思念。

曾经走过的田埂现在还是田埂，曾经走过的我却不是原来的我。虽然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时光，但我的心里始终记着那一道道熟悉的田埂、那一条条回家的路。